



英语官方化与美国“语言霸权－国家认同”建构

——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结构主义批判

万江¹ 丁建新²

【摘要】2025年特朗普政府指定英语为美国官方语言，使得美国自建国以来便存在的官方语言争议再度升温。为探究美国当代语言政策的本质及其与殖民遗产、经济不平等、制度暴力的内在关联，本研究基于托尔夫森历史结构主义分析框架，从权力再生产机制、结构性不平等、历史连续性三个维度，结合文献分析与历史脉络梳理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美国语言政策通过教育领域的“文化过滤”、就业领域的职业晋升壁垒、以及公民身份领域的意识形态绑定，实现了系统性的权力再生产。研究结论指出，该政策并非偶然的政治产物，而是美国历史上“语言霸权—种族等级—阶级固化”结构的现代延续，其争议的本质是“谁有权定义美国”的权力博弈，暴露了自由民主制度下结构性不平等的顽固性。

【关键词】语言政策；历史结构主义；语言霸权

1 万江，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邮箱：wanj33@mail2.sysu.edu.cn

2 丁建新（通讯作者），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批评语言学、韩礼德语言学、新媒体话语分析、文化研究、学术翻译研究。邮箱：jxding8@sina.com



English Offici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Hegemony-National Identity: A Historical Structuralist Critique of U.S. Language Policy

Wan Jiang¹ Ding Jianxin²

[Abstract] The designation of English 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2025 has reignited the long-standing controversy over this issue, which has persisted since the nation's founding. To investigate the nature of contemporary U.S. language policies and their intrinsic connections with colonial legacy,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institutional violence, this study employs Tollefson's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structuralism. The analysis unfolds along three dimensions: mechanisms of power reproduction, structural inequality,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 integrating literature review with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U.S. language policy systematically reproduces power through "cultural filtering" in the educational sphere, barriers to career advancement in the employment sector, and the ideological binding of language to citizenship.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is policy is not an accidental product of contemporary politics but a modern 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hegemony, racial hierarchy, and class solidification." The essence of the controversy is a power struggle over "who has the right to define America," exposing the tenacity of structural inequality within a liberal democratic system.

[Keywords] Language Policy; Historical Structuralism; Language Hegemony

-
- 1 Wan J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aerch interest: Social Linguistics.
Email: wanj33@mail2.sysu.edu.cn
- 2 Ding Jianxin(Corresponding Auth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aerch interests: Critical Linguistics, Halliday Linguistics, Discourse Analysis of New Media, Cultural Studies and Academic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jxding8@sina.com



引言

2025 年 3 月 1 日，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了第 14224 号行政命令，指定英语为美国的官方语言，同时废止了克林顿时期的第 13166 号行政命令¹（The White House, 2025）。特朗普的这一行政举措，凸显了其在强化英语地位方面的政策倾向，也在美国社会引发了广泛且深入的讨论与争议。事实上，美国关于是否确立官方语言的争议由来已久，自建国初期便已存在，并一直延续至今（胡壮麟，2018）。回溯过往，众多美国国会议员曾多次试图通过立法途径将英语确立为官方语言，然而，每一次的尝试都因深深根植于社会土壤中的政治分歧以及广泛存在的社会争议而被迫搁置。但这些尝试并非毫无效果，围绕着官方语言这一议题，美国推出官方了一系列语言政策与规划，它们宛如一面面镜子，映射出在不同历史阶段背景下，美国官方对于“谁是美国人”这一命题的独特理解和态度变迁。随着 2024 年美国大选的落幕，共和党凭借全方位的优势战胜民主党，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这一政治格局转变标志着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领域的强势回归。特朗普的竞选承诺始终秉持“美国优先、白人至上”的理念，此次签署的行政命令便是该理念在语言政策领域的具体体现（Wojczewski, 2020）。其背后折射出特朗普的宏大野心，即试图借助系统性政策构建以英语为核心的国家认同体系，通过设置语言壁垒来强化主流文化的霸权地位，进而将语言政策异化为筛选“理想移民”以及重构国家认同的制度性工具。本文试图从历史和结构维度入手，探究美国当代语言政策的本质，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揭示其与殖民遗产、经济不平等以及制度暴力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语言政策研究

从历史上看，关于语言政策及相关理论的国外研究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步。1957 年，语言学家尤利尔·威因里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讨论会上首次提出“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这一术语，开启了语言政策研究的先河。此后，英国学者克里斯·肯尼迪和丹尼斯·阿格尔先后阐述了语言政策的基本理论，并分析了其提出的根本原因。以色列学者斯波尔斯斯基（2004）在其著作《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中探讨了语言政策研究中的诸多前沿热点问题，并提出语言政策由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和语言意识形态三个部分组成，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¹ 即《改善英语能力有限人士获取服务的途径》命令，这项命令要求各级行政机构提供除英语之外的公共语言服务。



除基础理论外，众多学者深入研究了语言政策与社会、文化的关联。罗伯特·库伯（1989）细致描述了语言规划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托马斯·利森托（2006）在《语言政策：理论与方法》（*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Policy: Theory and Method*）中阐述了语言、社会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莱特（2006）则探讨了语言在民族建构过程中充当组织原则和推动力的作用。哈罗德·谢夫曼（1996）认为语言政策可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且政策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受隐性政策影响。詹姆士·托尔夫森（1991）分析了国家权力机关如何利用语言教育政策控制民众对语言权利和教育的获取，以及语言教育政策对不同语言群体产生的政治影响，并在其著作《语言规划与不平等：社区中的语言政策》（*Planning language, planning inequality: Language policy in the community*）中提出了语言政策的历史结构主义分析框架。

将目光转向近期的研究，可以发现美国语言政策的研究视角正在发生显著转变。以往侧重于问题解决和国家统一的宏观技术导向，正逐步转向关注权利保障、资源利用和社会公平等微观及中观层面。与此同时，研究对象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不再局限于官方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而是扩展到涵盖移民语言、濒危语言，乃至数字空间中的语言实践等多个领域。

在这一演变背景下，近期学者对美国现行语言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例如，Linda Harklau 与 M. Katherine Ford（2022）的研究详尽探讨了美国英语学习者教育和教师培训政策的复杂性。他们指出，这些政策深受多层面社会历史背景和相互冲突的话语影响，并揭示了集权与分权、单语与多语、以及针对特定需求的政策与保障公平获取主流课程的政策之间存在的显著矛盾。在双语教育领域，River Chávez Santos 等人（2024）的文献计量研究则聚焦于跨文化双语教育，强调了其在促进跨文化能力、双语能力以及保护和推广本土语言方面的重要性，凸显了双语教育超越单纯语言教学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价值。此外，从更广阔的全球背景来看，Carola 与 Marcelo（2024）的研究指出，全球化带来的移民潮使得移民背景学生成为教育体系中日益重要的群体。尽管这些学生具备多语言能力等独特优势，但当前的学校系统在满足其社会心理需求方面仍显不足。

综上所述，近年来西方学者的研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美国语言政策的具体实践及其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关联。这些研究共同强调了“语言权利”与“教育公平”之间的紧密联系，并指出了语言政策在国家发展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跨域宏观政策分析到微观实践解读，同时关注不同语言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语言权利保障，体现了出更加细致入微、多元均衡的研究向。



但是，近年来美国国内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激烈对抗，导致语言政策反复调整，学界逐渐缺乏宏观层面的系统分析。鉴于此，本文将从宏观角度出发，借鉴托尔夫森的历史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对美国当前的语言政策展开深入分析，旨在揭示其与殖民遗产、经济不平等以及制度暴力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关联。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历史结构主义（historical structuralism）是批判性语言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为揭示语言政策深层逻辑及其社会影响提供了深刻视角。该理论的诞生，是对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主流语言规划理论局限性的一种深刻反思与批判。当时，主流的语言规划研究普遍呈现出一种“技术主义”或“工具主义”倾向。这些研究往往将语言问题视为孤立的技术难题，致力于构建“高效”的语言规范化、现代化模型，其目标是促进国家统一、提升沟通效率。然而，这一范式存在明显的缺陷：它倾向于忽视语言政策背后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权力维度，常常默认或服务于国家精英阶层的利益，而对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导致的社会不平等、族群压迫和文化霸权问题保持沉默。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随着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思潮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兴起，学者们开始愈发关注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问题，历史结构主义应运而生。

这一理论在托尔夫森的著作《语言规划与不平等：社区中的语言政策》中得到了系统阐述。他强调，语言政策并非孤立的、技术性的行政安排，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复杂互动的结果。国家权力机关常常将“语言教育政策”作为一种工具，经由对民众获取语言权利和教育资源途径的控制，从而对不同语言群体施加深远政治影响（Tollefson, 1991）。这一视角使其成为深入剖析美国当前语言政策背后复杂的权力博弈与历史延续性的理想理论工具。

历史结构主义的精髓在于其两大支柱：历史性与结构性。前者强调任何语言政策都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脉络中。这要求我们不能将一项政策视为当下政治的孤立产物，而必须追溯其历史渊源，理解它是如何从过去的社会冲突、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演变而来的。后者则聚焦于社会结构（如教育体系、劳动力市场、法律制度）如何系统性地制造并维持不平等。语言政策正是通过这些社会结构发挥作用，将语言能力转化为一种社会资本，从而对不同群体进行资源分配和机会筛选，最终服务于巩固现有的社会等级秩序。通过运用这一框架，本研究力图能够识别语言政策中的深层矛盾和权力不对称，从而超越对语言问题的



表面理解，揭示其与更广泛的社会不公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本研究将从权力再生产机制、结构性不平等和历史连续性三个角度对美国当前的语言政策进行审视。

为在上述理论框架下展开深入分析，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与文本分析法。

文献研究法：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语言政策、历史结构主义、美国移民史及相关政治、社会学理论的学术文献。目的在于构建坚实的理论基础，了解研究现状与争议焦点，并将本文的分析置于更广阔的学术脉络之中，以确保研究的学理深度。

历史分析法：为探究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连续性”，本研究运用历史分析法，回溯了自美国建国以来，尤其是在三次移民浪潮中，语言政策与排外主义、国家认同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关键历史时期的考察，揭示当前政策的历史根源。

文本分析法：本研究对关键的政策文本、法律条文、官方声明及重要政治人物的公开言论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例如，通过解读特朗普签署的第 14224 号行政命令、入籍考试的修订内容以及废除相关教育拨款的官方理由，剖析其语言表述背后的意识形态意图和权力逻辑。

通过将这三种研究方法相结合，本研究得以将宏观的理论框架与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材料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对美国语言政策展开全面、系统且有深度的批判性分析。

三、研究发现

本章节旨在揭示，特朗普政府如何通过在教育、就业及公民身份认证三大领域建立环环相扣的制度性壁垒，将抽象的英语霸权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权力再生产机制。

3.1 英语作为权力再生产工具：语言标准化的制度性建构

正如韩礼德 (Halliday, 1978/2001) 所言，语言并非中性的表意工具，其词汇与结构中蕴含的符号与象征意义，正是在权力交错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特朗普政府的语言政策，正是利用了语言的这一社会属性，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建构，将英语的符号意义与国家认同、阶级地位强制绑定。

随着美国社会保守主义的全面回潮，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的价值观，试图通过系统性政策构建以英语为核心的国家认同体系，通过教育、就业与公民身份认证系统固化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将语言能力转化为阶级准入壁垒，将语言政策转变为筛选理想移民、重构国家认同的制度性工具，形成“英语霸权—职业分层”的闭环。这一机制不仅限



制了非英语母语群体的社会参与，还通过文化资本垄断和意识形态规训，强化了社会分层和权力结构的再生产（Flores & Rosa, 2015）。

3.1.1 教育领域：英语标准化测试与阶级准入壁垒

美国公立教育系统以英语标准化测试（如 SAT、ACT）为核心，其内容高度依赖白人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本。例如，SAT 阅读材料常涉及西方古典文学、高尔夫运动等主题，与少数族裔的日常经验相去甚远，构成隐性的“文化过滤”（Zhang, 2022）。这一过滤机制的本质，可以通过社会学家伯恩斯坦的“语码”（code）理论得到深刻解释。伯恩斯坦认为，不同社会群体对特定语境下语言功能的取向有所不同，这形成了不同的语言“语码”。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所习得的语码与学校教育所要求的语码具有连续性，而工人阶级或少数族裔家庭的子女则不享有这种连续性。因此，标准化测试的失败并非源于少数族裔学生语言系统或能力的缺陷，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亚文化与学校教育之间存在价值观、交际模式和学习风格的断裂。这种去语境化的测试设计，将英语能力扭曲为阶级准入的意识形态工具，非英语母语学生因文化陌生感在理解上天然处于劣势。鉴于测试成绩直接决定教育路径的分流，拉丁裔学生因 SAT 分数偏低被分流至社区学院的比例是白人学生的数倍之多（Kanno & Varghese, 2010）。社区学院在课程设置和师资力量上与四年制大学存在显著性差距，限制了非英语母语学生的转学机会和社会流动。此外，教师评估体系将学生测试成绩与教师绩效挂钩，迫使教师采用应试教学，进一步边缘化语言少数群体的文化表达（García & Torres-Guevara, 2010）。以上机制塑造了一个恶性循环：语言能力不足导致教育路径降级，进而阻碍社会流动，体现了通过教育制度维持阶层固化和文化资本代际垄断的权力逻辑。这正应了韩礼德对伯恩斯坦理论的引申：如果通往社会公正的道路在于受教育，而受教育又必须接受特定的语码，那么那些没有通往这些语码途径的受教育者就会被剥夺社会正义（丁建新, 2016）。

3.1.2 就业领域：职业准入：语言门槛与专业能力绑定

在劳动力市场，语言能力通过职业资格认证的专业能力绑定机制，强化了非英语母语群体的职业区隔。例如，护理执照考试（NCLEX）要求医学英语达到 C1 水平，导致许多少数族裔护理专业毕业生因术语理解偏差或是难以顺畅同患者沟通而无法获得执业资格，被迫从事低薪护工岗位（Ali & Watson, 2018）。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满足了医疗机构对廉价移民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语言门槛限制非英语母语者的职业晋升，形成“技能保留、地位剥夺”的双重剥削机制。它不仅剥夺了少数族裔的职业发展机会，还通过语言壁垒维护了白人中产阶级的职业垄断权，进一步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阶层结构。



3.1.3 公民身份领域：语言测试与意识形态规训

特朗普政府构建了英语能力等同于公民身份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框架，系统性地将非英语母语人口排除在合法公民范畴之外。首先，特朗普多次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英语是“统一语言”，将多语服务污名化为“分裂国家”。他在 2020 年推动公民入籍考试改革，修订后的入籍考试试题数量从 100 题增至 128 题，尽管很快被拜登政府推翻，但是 2025 年 9 月 18 日特朗普推出了新一次改革，英语测试难度大大提升，并大幅增加美国历史与文化、政治理论考核比重（Federal Register, 2025）。例如，部分题目要求申请人解释《独立宣言》和《宪法》中的抽象思想，将语言能力与白人主流文化认同直接绑定。这种设计将语言测试转化为文化同化工具，不仅提高了入籍门槛，还通过意识形态规训重构了国家认同的边界，强化了非英语母语群体的公民权利压缩。

可以看出，这些语言政策通过教育、劳动力市场和公民身份认证的制度化设计，以语言能力为工具，系统性地限制了非英语母语群体的社会参与和资源获取。这种政策不仅通过文化资本的垄断维持社会分层，还通过意识形态规训巩固了权力结构，凸显了语言作为权力再生产工具的深远影响。

3.2 社会结构性不平等：交叉压迫与空间分异

通过上述语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非英语母语群体的公共服务获取劣势被进一步制度化。这种权力再生产机制通过“政策—实践”的传导链条，在教育、就业和公民权利领域催生了三重结构性断裂，系统性地限制了非英语母语者的社会参与和资源获取。这种断裂不仅强化了社会不平等，还通过语言作为规训工具，巩固了权力精英对社会结构的控制（Flores & Rosa, 2015）。

3.2.1 教育资源分化：资源剥夺与“单语囚笼”

教育机会的分化显著加剧了非英语母语群体的边缘化。少数族裔聚集区的语言教育资源被系统性抽离，导致教育不平等进一步固化。例如，2025 年美国教育部宣布终止 6 亿美元的教师培训拨款，理由是这些项目被指推广“分裂意识形态”。然而，这些项目主要支持高需求学校（通常位于少数族裔社区）的教师培训，特别是在双语教育领域。此举可能导致加州、德州等多地的双语教育项目停摆，引发了包括加州在内的七个州对特朗普政府的诉讼（Meckler, 2025）。此外，美国部分州受历史上唯英语运动影响，曾出台政策对教师使用母语教学或是学生在课堂使用母语施加纪律处分，少数族裔的文化传承被污名化为“反美国性”，从而构建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英语单语囚笼。这种对于教育领域展开的垂直分化，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的观点，实质上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再生产阶级结构，客观限制了非英语母语者的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

3.2.2 就业技能贬值：语言壁垒与职业垂直区隔

非英语母语群体在职业晋升中面临阻塞，语言障碍导致其技能被系统性贬值。例如，在美国，约 65,000 名外国培训的医生（占 247,000 名外国培训医生的 26.32%）因语言障碍无法以医生身份执业，被迫从事医疗助理或技术员等较低职位，形成了显著的职业晋升壁垒。研究表明，语言不熟练的患者（LEP 患者）因沟通失败导致不良事件的概率更高，其中 49.1% 涉及可检测的身体伤害，46.8% 为中度或更严重的临时伤害，占所有沟通失败事件的 52.4% (Hilal Al Shamsi et al., 2020)。非英语母语的医疗专业人员因语言障碍常被视为能力不足，限制了其晋升至管理或专家职位的机会。同时，语言障碍增加了医疗服务成本，例如使用口译服务每年额外支出约 470 万美元，这可能促使雇主更倾向于雇用英语熟练的员工，进一步排斥 LEP 专业人员 (Hsieh, 2016)。语言在此被用作规训工具，企业以效率之名实施语言清洗，实质上将移民劳动者固定在从属阶级，维系了“白人专业精英—少数族裔廉价劳工”的二元职业结构。

3.2.3 公民权利压缩：公共服务语言清洗与政治边缘化

公民权利的空间因语言壁垒而不断压缩，公共服务领域的语言清洗进一步加剧了非英语母语者的边缘化。例如，2025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上任当天，白宫官网即移除西班牙语页面，显示“404 Page Not Found”错误，同时暂停了社交媒体平台“X”的西班牙语账号，此举显著限制了西班牙语使用者获取政府信息的渠道。同年 3 月，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国土安全部为移民身份或福利咨询提供的翻译服务，使非英语母语者在处理移民事务时面临更大障碍，可能导致福利或就业机会被错误拒绝。此外，特朗普政府取消与多样性、公平与包容 (DEI) 相关的计划，导致部分听障联邦员工失去美国手语 (ASL) 口译服务，削弱了其获取政府服务的能力。这些政策将语言能力转化为公民身份合法性的实质门槛，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英语能力不足导致公共服务获取受限，进而造成政治参与的边缘化。

综上所述，语言政策的系统性设计通过教育、就业和公民权利领域的结构性断裂，导致了非英语母语群体的社会边缘化。这些政策不仅限制了资源获取和社会流动，还通过隐性或显性双重语言“规训”巩固了权力精英对社会结构的控制，凸显了语言作为权力“再生产”工具的深远影响。

3.3 语言排外的历史连续性及现代转型

美国现今的语言政策并不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一时兴起的产物，其本质是美国长期存在的“语言霸权—种族等级—阶级固化”结构的当代延续。美国自建国以来，始终在移民国



家的多元身份与排外主义的周期性反弹之间摇摆，这种张力构成了其国家发展的核心悖论，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

3.3.1 奠基时代：事实霸权与“沉默”策略

英语在美国社会主要扮演了两个角色——共同语言和事实上的官方语言，这对理解长期以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争议十分重要（李英姿，2009）。前者表明英语是美国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后者表明英语是美国政府在处理公共事务时使用的语言，不过并没有明文规定，而是一种约定俗成，属于隐性语言政策的范畴。在此需要厘清的是，“美国没有官方语言”指的是，美国不存在联邦层面法律规定的官方语言，而截至 2016 年，美国便已有 26 个州及 2 个海外属地将英语确定为唯一官方用语，并另有 3 个州和 4 个地区将英语列为官方语言之一，其他地区则因为民族、宗教或人口结构等原因未做规定（胡壮麟，2018）²。美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联邦制移民国家，由于人口结构复杂、政治权利分散等原因，境内使用的语言堪称五花八门，导致美国官方奉行多元化的语言治理态度。然而，英语霸权在美国历史上却是根深蒂固。

在独立战争之前，早期北美殖民地的最大族群便是来自于英国的清教徒移民，占据了人口及语言上的绝对优势。加之彼时北美殖民地主要是英王直辖殖民地，按照当时的法律约定，殖民地的建立名义上都要承认英王的最高统治权并由英王任命的总督进行统治，这从法律角度上保障了英语的优势地位（于江霞，2014）。英语也成为北美大陆事实上的通用语言。

到了美国建国之时，除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表达的一些顾虑之外³，美国的国父们整体上对官方语言这一问题保持缄默，为后续的争议埋下了伏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显然不是一时疏忽，而是一种折中策略。具体来说，1787 年制宪会议的核心任务是构建各州共识，避免因为争议议题导致联邦分裂。而建国初期的美国，约有 15% 的移民来自非英语国家，确立单一官方语言与其个人自由的建国宣言相悖，可能阻碍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移民迁入，也可能冲击到依赖黑奴劳动力的南方种植园经济，风险太大。由于英语的压倒性优势地位，英语的事实上通用语地位无需立法强调。因此，在制定宪法时，美

2 关于美国具体有多少州立法设英语为官方语言这一数据存在若干争议，本文采取胡壮麟在 2018 年发表的论文《美国新世纪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所统计的版本，其统计截止日期为 2018 年，故此处数据仅采用截止至 2018 年。

3 1755 年，本杰明·富兰克林曾担心德裔移民会使其语言和习俗在宾夕法尼亚州占主导地位，冲击英语地位。1780 年，约翰·亚当斯致信国会，提议制定“美国文法，以规范、改进和明确英语”，但这一提议被认为“不民主，对个人自由构成威胁”而未被采纳。



国国父们并未对官方语言进行强制性规定，民众也并未就此提出颇具规模的争议。尽管美国在立法层面对语言问题保持沉默，但是在事实层面却展现出了对英语的不遗余力的拥护，主要表现在对美国英语规范化的积极推进，例如编写《韦氏美国拼写字典》和《美国英语词典》。这使得英语作为事实上美国通用语言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稳固（于江霞，2014）。

3.3.2 移民浪潮与排外主义：语言边界的构筑

而后，美国历史上的三次移民浪潮⁴带来的大量非英语移民的涌入使得美国社会对移民取代自身主体地位产生的恐惧，反映在了语言方面，便是担心语言多样性会取代英语主体地位。这些移民的差异性被放大为威胁国家统一的结构性危机，而排外主义则成为调和阶级矛盾、巩固主流群体特权的意识形态工具。此时，英语便被赋予了维系民族认同、强化社会分层的符号权力，成为区分合法公民与外来者的核心边界。

具体而言，1820 年到 1860 年的第一波移民潮大部分来自爱尔兰和德国，出于宗教对立和文化异质的因素，在某些排外主义团体的煽动之下，移民集中的区域时常发生针对移民的排斥行为。此外，针对美洲原住民，美国政府也于 1819 年出台了《文明法案》⁵，使得印第安人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受到严重冲击，导致超过 300 种原住民语言濒危，体现了其通过语言工具实现领土扩张与种族清洗，进而消灭文化主权的掠夺本质（宋银秋，2013）。

1880 年到 1920 年的第二波移民潮大多数来自东南欧和亚洲国家，他们的背景和宗教信仰与美国人差异本身就较大，他们抱团取暖的聚居方式和对工作机会的挤占等一系列因素使“排外主义的所有发酵剂都达到顶峰”（Higham, 1981），引发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排外主义浪潮。于是，在此期间，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法案限制移民入境、推崇英语霸权，这体现在在移民政策中加入的语言筛选机制。1894 年，一群哈佛大学毕业生发起了“限制移民联盟”，并一直致力于推动将英语能力作为筛选移民的文化指标，最终在 1917 年《移民法》中以“文化测验”的形式合法化（于江霞，2014）。这一政策并非

4 关于目前为止美国历史上的历届移民潮，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历史上一共有四次移民潮，第一次是殖民地时期的英格兰盎格鲁—新教移民潮，第二次是 19 世纪 30-50 年代的爱尔兰、德国移民潮，第三次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新移民潮（其中包括旧移民），第四次是二战后的移民潮；另一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稍有不同，认为美国历史上至今只出现了第三次移民潮，除了不认为殖民地时期的移民潮之外，其他三次移民潮与第一次相同。笔者在本文的撰写中采用第二种观点。

5 1819 年通过的《文明法案》（Civilization Fund Act）是美国针对印第安人的同化政策之一，旨在通过资金支持、教育和文化传播等方式改变印第安人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将其转变为符合白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文明”生活方式。



单纯的语言标准，而是通过制度性排斥维护白人盎格鲁 - 撒克逊新教（WASP）群体的文化霸权。1906 年出台的国籍法更是首次以联邦法律形式将英语能力定为入籍条件，标志着英语从民间通用语上升为公民身份的政治符号，完成了“语言—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绑定（丁则民，2001）。在一系列针对不同种族的排外法案出台之后，许多州也明确对英语的推崇和对外文的压制。20 世纪初约 30 个州通过“英语唯一”法案，强制公立学校使用英语教学。尽管 1923 年联邦最高法院在 Meyer v. Nebraska 案⁶ 中判定此类法律违宪，但地方层面的语言压制持续存在，反映出英语霸权已内化为地方权力结构的文化惯性（Wiley & Wright, 2004）。一战期间，美国国内反德情绪达到顶峰，约 16 个州立法禁止公立学校教授德语，许多德裔美国人被迫改名。这一现象不仅是战时情绪的产物，更体现了英语被建构为爱国主义的载体，非英语则被污名化为叛国象征。此外，这一时期对于印第安人的同化政策更是变本加厉，为了达到其文化灭绝和社会控制的目的，美国政府设立了上百所保留地外寄宿学校，采用军事化管理，强制剪发、改名、穿制服，同时推行唯英语教育，对违者进行体罚（宋银秋，2012）。这一举措使得 80% 的印第安语言濒危，在寄宿学生群体中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和身份危机。这一时期，美国通过推行英语单语主义，试图将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熔铸成“英语—美国”的想象共同体，消解族裔差异带来的离心力。然而，这种暴力同质化过程暴露了民族国家的内在矛盾——它以“统一”之名行“排斥”之实，为后续少数族裔的语言权利斗争埋下了伏笔（Flores, 2016）。

3.3.3 民权时代的转向：多元主义的进步与局限

第三次移民潮在 1960 年代开始，但是出于一系列因素，在其初期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外语排斥现象，反而促进了美国双语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冷战初期的“人造卫星危机”⁷使美国开始重视外语教育并于 1958 年出台了《国防教育法》，英语单语主义开始松动，语言政策从文化同化工具转向战略竞争资源，客观上促进了美国外语教育的普及（李艳红，2015）。另一方面，为了赢得和苏联的意识形态竞赛，美国将自己包装为多元包容的国家并对他国移民重新敞开了大门，加上民权运动的兴起使得种族平等、人权等理念深入人心，

6 一战后，美国社会出现了强烈的反德情绪，内布拉斯加州通过了一项《外语法》，禁止在小学一至八年级教授外语，包括德语。罗伯特·T·迈耶是一名在汉普顿镇犹太教学校任教的教师，他使用德语编写教材教授学生阅读。然而，他的行为被指控违反了该法律，最终被判处罚款并面临刑事指控。于是迈耶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获得胜诉，裁决内布拉斯加州的法律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此为迈耶诉内布拉斯加州案（Meyer v. Nebraska）。

7 人造卫星危机（Sputnik Crisis）起源于年苏联成功发射地球人造卫星，引起美国对苏联教育体制的关注。调查意外发现，苏联耗费巨大精力学习外语。美国政府随即通过《国防教育法》，加强对专业领域研究的资金投入，同时也为非西方语言的研究提供财政支持。



人们更加反对基于种族、国籍的歧视性政策。于是，这期间涌人的大量移民带来的语言文化多样性需求以及国内平权运动的推进，加之苏联常常利用种族问题对美国进行国际舆论上的批评，使得美国政府推动了一系列文化融合的政策。诸如《民权法案》和《选举权法》在制度层面消除了对公民种族、宗教、性别和国籍的歧视，为双语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在这一背景下，最终促成了《双语教育法》的通过，标志着美国双语教育的全面展开（刘艳芬 & 周玉忠，2007）。这一阶段是美国语言政策结构性矛盾中的有限进步，期间首次以联邦法律形式承认了母语在教育中的合法地位，尽管《双语教育法》的最终目的仍是过渡到英语，但客观上促进了美国多语主义的发展。

3.3.4 保守主义回潮：“唯英语运动”与单语主义复归

然而，好景不长，大量移民的涌入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在越战泥潭、石油危机和经济衰退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这些问题在 70 年代开始显现，激发了美国本土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涨。这一变化重新点燃了人们对民族身份认同的探求，并将语言问题作为政治冲突的焦点（蔡永良，2005）。进入 80 年代，以里根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逐渐崛起，初代 MAGA 运动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唯英语运动”在美国兴起，标志着排外主义和英语单语主义的回潮。

“唯英语运动”始于 1981 年，主要分为英语官方化运动和废除双语教育运动。前者虽然未能获得联邦政府支持，但成功转向向地方州政府游说，最终促使 31 个州立法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后者则始于 1996 年，其导火线是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一次抗议活动。抗议者认为学校推行的双语教育影响了子女的教育质量，该事件后来被有心人利用，推动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相继通过法案，废除了当地双语教育⁸。在这一事件中，表面是教育质量争议，实则为语言问题被异化为阶级矛盾的替罪羊。这种意识形态遮蔽在 2002 年《英语习得法》⁹ 中达到顶峰，使得联邦拨款从“母语辅助”转向“英语沉浸式教学”。《双语教育法》被正式取缔，标志着唯英语运动的尾声（蔡永良，2016）。

3.3.5 当代转型：身份政治、地缘竞争与历史镜像

进入新世纪，随着美国在海外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各方面的诉求持续增长，美国出台了一系列外语教育政策，以期培养更多拥有高水平外语技能、了解多元文化的人才，以

8 2016 年底，加州批准了 58 号提案，即加州多语言教育法，重新恢复了当地双语教育。

9 《英语习得法》也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于 2002 年 1 月 8 日正式签署生效。其取消了 1968 年《双语教育法》的联邦支持，要求公立学校以“英语浸入式教学”取代传统的双语教育模式，标志着美国语言政策重新从多元包容转向单一英语导向。



保证美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领先地位（贾爱武，2007）。这与上世纪 60 年代的《国防教育法》异曲同工，本质上都是对外部威胁的工具性调整，缺乏对语言多样性的内在价值认同，揭示出语言政策始终服务于深层的阶级、种族与地缘政治结构的本质。

但是，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尽管民权运动在法律层面终结了种族隔离，系统性歧视在美国依旧根深蒂固。黑人群体在教育、就业、司法等领域的结构性劣势也开始暴露，催生民众对“形式平等”的反思。这种“权利平等但结果不公”的困境，加上经济方面的不平等与种族身份的高度重叠，迫使少数群体转向以身为纽带的集体抗争，自此，身份政治开始席卷全球（Alexander, 2020）。身份政治强调基于族裔、性别、性取向等差异化的社会身份争取权利和平等，其初衷是消除对少数群体的歧视，促进社会公正与多元文化的发展。然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身份政治逐渐被美国两党利用，沦为争取选票的政治工具：民主党支持双语教育以争取少数族裔选票，却未触及英语霸权的核心；共和党则通过推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立法强化白人身份认同（Flores & Rosa, 2015）。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和文化认同的互存关系，在后现代的话语与权力理论结构下更突显其社会矛盾、政治文化的“战争”性质。这种“战争”深刻揭露了美国社会在文化认同背后的身份危机与利益冲突，使得语言多元、语言扩张与“语言国家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彻底沦为党派斗争的核心议题之一（丁建新，2013）。

回溯历史，特朗普任期的许多政策都能在美国过往的语言政治脉络中找到镜像投射。在特朗普任内，2025 年 2 月终止的 6 亿美元教师培训拨款，导致加州、得克萨斯州等少数民族聚集区的 237 个双语教育项目停摆，这同 20 世纪初各州推行的外语教学排斥如出一辙，二者均以“国家统一”之名，行文化清洗之实，系统性消解少数族裔的语言生存空间。而 2019 年修订的“公共负担”¹⁰ 规则对移民的英语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同一百年前的“文化测验”跨时代呼应。

在当下美国面临内部分裂与外部竞争的双重压力之际，特朗普政府推行英语官方化政策，本质上是保守主义势力试图通过语言符号重构政治认同的战略选择。其核心意图有二：一方面，以强硬的文化保护姿态向核心选民传递维护传统美国价值观的政治信号，通过制造“语言纯洁性”的叙事巩固基本盘；另一方面，借助语言标准化工程构建文化同质性框

10 “公共负担”概念可追溯至 1882 年美国《移民法》，旨在确保移民能够自给自足，而非依赖政府援助。特朗普政府曾在第一任期内对“公共负担”政策进行变革，大幅提高移民门槛，从财富、年龄、教育技能、英语水平、健康等多个维度对移民进行综合评估，2020 年在短暂实施之后受诸多因素影响被叫停并于 2021 年被拜登政府废除，2025 年 3 月 27 日特朗普再次恢复该政策。



架，将英语能力与公民身份合法性强制绑定，使语言成为筛选理想移民、区隔内部成员与外来者的制度性壁垒，最终实现对主流文化霸权的系统性维护。

四、结论与不足

根据托尔夫森的历史结构主义，美国语言政策本质上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的复杂产物，而非单纯的技术或行政安排（Tollefson, 1991）。以特朗普政府第14224号行政命令为代表的“英语官方化”政策，是保守主义势力通过语言符号重构国家认同、维护主流文化霸权的战略选择，体现了“语言霸权—种族等级—阶级固化”的历史延续性。特朗普政府通过三重制度性建构实现阶级壁垒的合法化，强化社会分层与权力结构的再生产，实现对少数语言群体的结构性压迫。在教育领域，以英语标准化测试作为核心评估体系，形成隐性“文化过滤”；在就业领域，通过职业资格认证将英语能力与专业技能强制绑定，形成语言壁垒的职业“天花板”；在公民身份领域，将英语能力等同于公民合法性，完成“语言—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绑定（丁则民，2001）。

美国当前语言政策并不是当代政治语境的偶然产物，而是美国自建国以来语言排外主义的现代转型，根植于移民国家的身份悖论与排外主义的周期性反弹。这种政策通过“英语纯洁性”叙事制造社会分裂，既延续了殖民时期对原住民语言的文化灭绝暴力，又以“国家统一”之名掩盖了经济不平等与阶级矛盾。这一系列语言政策的技术中立表象下隐藏着深刻的政治意图，揭示了其作为意识形态规训工具的本质。

当前研究更多聚焦于联邦层面的政策分析，对美国各州与地方层面的语言实践差异探讨不足；同时，缺乏对非英语母语群体的微观经验研究，未能充分呈现政策对个体的多重影响，难以揭示语言壁垒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微观侵蚀机制。未来研究可以跨州比较分析地方权力结构对政策执行的形塑作用，或采用民族志方法追踪移民家庭的语言实践，同时结合全球化背景，对比美国与其他国家多语政策的异同，提炼移民国家结构性不平等的共性特征。

综上，美国语言政策的争议本质是“谁有权定义美国”的权力博弈。其演变历程暴露了自由民主制度下结构性不平等的顽固性。对于多语言社会而言，实现语言正义需超越工具主义框架，承认语言多样性的内在价值，将语言多样性视为不可让渡的人权，而非服务于政治博弈的策略性资源。唯有在教育、法律、公共服务中建立包容性语言生态，才能打破语言霸权，避免社会分裂，真正兑现“多元一体”的现代国家承诺。



【参考文献】

- 蔡永良 . (2005). 语言一致与文化趋同——解读美国惟英语运动 (1981-2002) [Language Consistency and Cultural Converg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U.S. English-Only Movement (1981-2002)]. 江苏社会学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03), 147-152.
- 蔡永良 . (2016). 美国的语言矛盾与冲突——唯英语运动 [Languag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nglish-Only Movement]. In (eds.), 语言生活皮书——世界语言生活报告 (2016) [*Language Life Blue Book: World Language Life Report (2016)*] (pp.121-130).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doi:10.26914/c.cnkihy.2016.007471.
- 丁建新 . (2013). 从话语批评到文化批评——“边缘话语与社会”研究 [From Discourse Criticism to Cultural Criticism: A Study on “Marginal Discourse and Society”]. 江西社会科学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09), 71-75.
- 丁建新 . (2016). 作为文化的语法——功能语言学的人类学解释 [Grammar as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Functional Linguistics]. 现代外语 (双月刊)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Bimonthly)*], 39(04), 459-469+582-583.
- 丁则民 . (2001). 美国移民史中的排外主义 [Nativism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世界历史 [*World History*], (01), 12-17+128.
- 胡壮麟 . (2018). 美国新世纪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in the New Century of the United States].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Journal of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02), 1-8.
- 贾爱武 . (2007). 以国家安全为取向的美国内外语教育政策 [U.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Orien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比较教育研究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04), 13-18.
- 李艳红 . (2015). 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的战略演变 [Strategic Evolution of U.S. Critical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Doctoral dissert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中国知网数据库 [CNKI Database].
- 李英姿 . (2009). 美国语言政策研究 [*A Study on U.S. Language Policy*]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nkai University]. 中国知网数据库 [CNKI Database].
- 刘艳芬 & 周玉忠 . (2007). 美国 20 世纪语言政策述评 [A Review of U.S. Language Policy in the 20th Century]. 山东外语教学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05), 42-45. doi:10.16482/j.sdwyt37-1026.2007.05.011.
- 罗辉 . (2017). 从国防安全到全球视野：二战后美国内外语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From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to Global Vision: A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U.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fter World War II] [Doctoral dissert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中国知网数据库 [CNKI Database].



- 宋银秋 . (2012). 美国政府强制同化印第安人教育政策的制订与实施 (1877-1928)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U.S. Government's Forced Assimilation Education Policy for Indians (1877-1928)] [Doctoral dissert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中国知网数据库 [CNKI Database].
- 于江霞 . (2014). 语言的自由与限制: 美国官方语言争议的历史学视角 [Freedom and Restriction of Languag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Controversy over U.S. Official Language]. 首都外语论坛 [Capital Foreign Language Forum], 57-64.
- Al Shamsi, H., Almutairi, A. G., Al Mashrafi, S., & Al Kalbani, T. (2020). Implications of language barriers for healthcare: A systematic review. *Oman Medical Journal*, 35(2), e122. <https://doi.org/10.5001/omj.2020.40>
- Alexander, M. (2020). *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10th Anniversary Edition)*. The New Press.
- Ali, P.A., & Watson, R. (2018). Language barriers and their impact on provision of care to patients with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 Nurses'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7(5-6), 1150-1160.
- Cooper, R. 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deral Register. (2025, September 18). Notice of Implementation of 2025 Naturalization Civics Test.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5/09/18/2025-18050/notice-of-implementation-of-2025-naturalization-civics-test>
- Flores, N., & Rosa, J. (2015). Undoing appropriateness: Raciolinguistic ideologies and language diversity in educatio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85(2), 149–171.
- Flores, N. (2016). A tale of two visions: Hegemonic whiteness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Policy*, 30(1), 13–38.
- García, O., & Torres-Guevara, R. (2010). Monoglossic ideologies and language policies in the education of US Latinas/o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Latino Education* (pp. 182–194). Routledge.
- Halliday, M. (1978/2001).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s: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Hsieh, E. (2016). *Bilingual health communication: Working with interpreters in cross-cultural care*.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658308>
- Kanno, Y., & Varghese, M. M. (2010). Immigrant and refugee ESL students' challenges to accessing four-year college education: From language policy to educational policy.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 Education*, 9(5), 310–328.
- Linda H. & M. K., Ford. (2022). English learner education and teacher preparation in the U.S.: An interpretive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Language and education*, 36(2), 137-151. DOI: 10.1080/09500782.2021.1981925



Meckler, L. (2025, March 20). What to know about Trump's plan to abolish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education/2025/03/20/trump-education-department-executive-order/\[\]](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education/2025/03/20/trump-education-department-executive-order/)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641470)

Ricento, T.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Policy: Theory and Method*. Wiley-Blackwell Pub.

River C. S., Omer C. C., Yuri R. M., Einstein S. B. & Angelica M. C. R. (2024). Bibliometric exploration of intercultural bilingual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scientific produc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Cogent social sciences*, 10(1), 2365973. DOI: 10.1080/23311886.2024.2365973

Schiffman, H. F. (1996). *Linguis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 Routledge, 1996.

Spolsky, B.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árez-Orozco, C. & Suárez-Orozco, M. (2024). Globalization, immigrant-origin students & the quest for educational equity.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21-42.

The White House. (2025, March 1). Designating English 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3/designating-english-as-the-official-language-of-the-united-states/>

Tollefson, J. W. (1991). *Planing language, planing inequality: Language policies in the community*. Longman.

Wojczewski, T. (2020). Trump, Popu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6(3), 292–311.

Wright, S. (2006).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From Nationalism to Globaliza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责编：陈世丹)